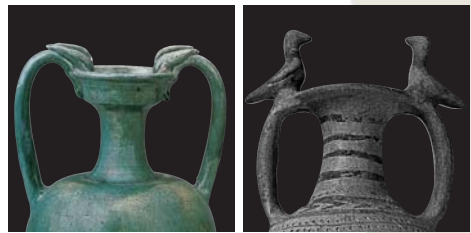


# 關於唐代雙龍柄壺



雙龍柄壺，是唐代陶瓷常見的器形。它可能是由六朝以來的雞頭壺演變而來，演變軌跡似有系譜可循。但作者提醒，也不能忽視，這種造型與薩珊波斯金屬器或遠溯阿契美尼德朝安弗拉式來通的關聯。

謝明良

於窄深帶唇的盤口、細長頸、豐肩、修腹、平底的盤口壺之口沿兩側至肩部位置置雙獸首弧形把的所謂雙龍柄壺，是唐代陶瓷常見的器形。從以往有關唐代文物的收藏或展覽、研究圖錄，不乏將這類作品圖像做為圖冊封面甚至宣傳海報上的主角，不難想像雙龍柄壺似乎也成了足以代表唐代文物造型裝飾的典型器式之一。然而，關於該一器式的淵源出自其實仍有若干疑難，至今未能完全解決。過去雖並存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即：其是由六朝以來雞頭壺演變而來的（A說），以及其可能是受到外來影響而成立的（B說），但相對於B說始終只是停留在雙龍柄壺造型與西方安弗拉瓶式（Amphora）有相近之處的單純指摘，未有論證，A說則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學的進展似已有較為明確的系譜可循，再加上近年來歐美的中國陶瓷史研究低迷，故原來出自半個世紀之前歐美學界倡議的B說就漸為人所遺忘，以致於今

日學界在談及唐代雙龍柄壺造型淵源時，幾乎已絕口不談外來影響的B說，而一致主張其係來自六朝以來的雞頭壺傳統。本文的目的，是擬先梳理雙龍柄壺的造型和裝飾特徵，而後以個人的理解和想像，結合現今的考古或傳世遺物，試著鋪陳A、B兩種論調，並談與之有關的幾個問題。

### 一、唐代雙龍柄壺的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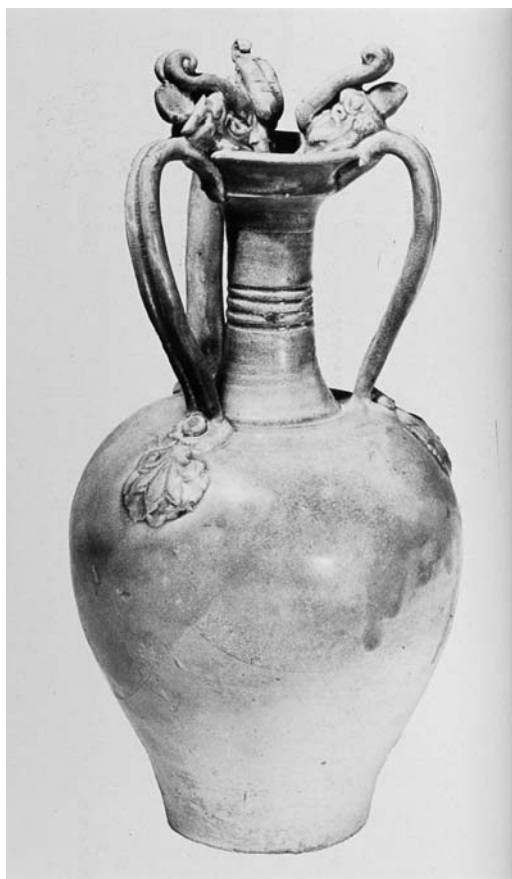
為了便於追蹤唐代雙龍柄壺的祖型以及行文上的方便，以下擬先針對其器式特徵做一簡要的歸類，即擬以平底或帶圈足者大致將之區分為A型和B型。我很清楚像是這樣的形式分類著實粗糙，比如說龜井明德所著，也是目前唯一的一篇資料蒐集齊備的討論唐代雙龍柄壺的專論，已將本文的A型細分為三型四式，並予以年代排序，讀者可以參照。（龜井明德，一九九九）然而，本文更關心的是祖型的追索，因此分類不宜過細，以便囊括此一類型的大多數作品。

事實上，目前所見唐代雙龍柄壺絕大多數均屬平底的A型。作品均施釉，釉的種類有於白胎上施罩高溫透明釉的白瓷，以及低溫鉛釉。前者因胎釉的成分或燒成氣氛，表釉有時偏青或呈牙黃色調，後者鉛釉可區分為單色釉和三彩釉，至於以鉛為助溶劑的單色釉則除了綠釉和褐釉之外，偶可見鈷藍色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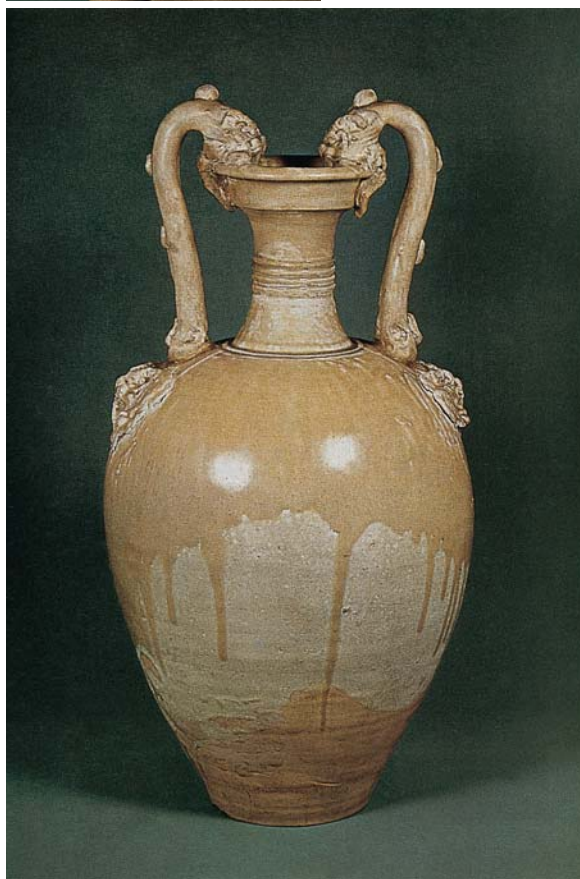
A型作品口沿兩側至肩部的弧形把多數均是以雙股泥條平行拼合而成，把背常間隔貼飾數量不等的乳丁飾，有的還於把上壓印圈紋或陰刻短線以表現軀體的鱗片或紋理。就此而言，目前所見唐代雙龍柄壺當中，雖有部份作品確如龜井明德所指出，其柄端獸首特徵不夠明確，有的形似鳳首或屬性不明的獸頭（圖一），然而考慮到把身造型以及暗示龍體鱗片的壓印圈紋，同時又有不少作品龍首帶角，特徵明顯，而其整體器形因和龍首特徵不夠明確的獸首帶柄壺完全一致，因此本文遂將少數龍首特徵不夠鮮明



圖一 局部



圖二 高37.5公分 英國牛津Ashmolean Museum藏



圖一 高60.8公分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的獸首柄壺也納入龍首柄壺的範疇。其次，雙龍柄壺之外，亦可見到帶三只龍把的作品（圖一）。另外，目前所見A型作品之龍首柄均只表現龍首和身軀上半部位，但少數作品龍身係蟠結於拉長的帶凸弦紋飾的長頸，並飾有龍的前肢、後足和尾，較為特殊（圖三）。至於個別作品，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利集團購藏的響銅製雙龍柄壺，雖然壺把龍體雕琢精細，龍鬚、角、翼、足、尾樣俱全（圖四），但整體予人感覺並不自然，故其是否有可能為近年製的贗品？還有待求證。

B型作品極少見到，但河南鶴壁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王仁波墓曾經出土，係於上豐下斂的盤口下置喇叭式細長頸，頸中央部位飾凸棱，豐肩，肩以下弧度內收，器底置外敞的圈足。龍口啣咬盤口，除了前肢攀附盤口，後足亦搭於壺肩，整體形似蜥蜴，其長尾則黏貼在器身腹，通高四六·五公分，整體施單黑釉（圖五）。



圖四 通高44.5公分 中國保利藝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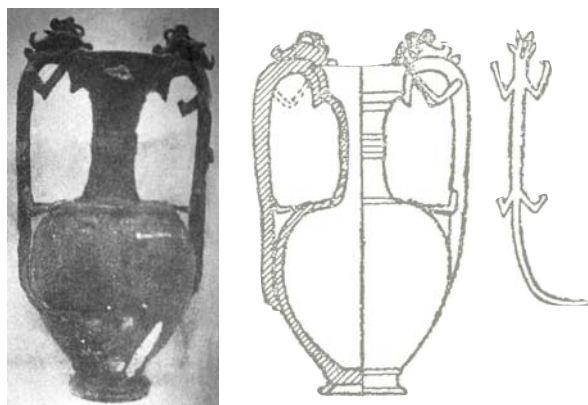
圖三 香港私人藏

## 二、出土情況和流行年代

儘管流傳於世的唐代雙龍柄壺的數量龐大，於各地的公私收藏單位都可輕易看到，但經正式考古發掘出土的實例卻不多，並且只見於陝西和河南兩省分，這意味著經常被視為大唐盛世文物典型作例的雙龍柄壺，其實只是

特定區域之間流行的器物。就我所能掌握到的唐代雙龍柄壺出土例，因有數例伴出墓誌，故墓主身分明確並有絕對的卒葬年代可考。依年代先後順序，計有：陝西富平縣上元二年（六七五）李鳳夫婦墓（李鳳為高祖李淵第十五子，揚州大都督，號王）、河南偃師垂拱三年（六八七）恭陵哀皇后墓（高宗五子李弘后）（圖六）、偃師聖歷元年（六九八）盛才墓、偃師長安三年（七〇三）張思忠夫婦墓（張良後代，終世無官）、偃師神龍二年（七〇六）宋禎夫婦墓（宋，延州刺史、授正議大夫，官四品）、偃師神龍二年（七〇六）宋祐墓（圖七）、陝西乾陵神龍二年（七〇六）章懷太子墓以及前述河南鶴壁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王仁波墓（表一參照）。除了王仁波墓出土帶圈足的B型，其餘各墓所見均屬平底的A型。雖然，在目前所知少數考古發掘例子當中，出土有雙龍柄壺的墓葬墓主身分似乎不低，包括皇后、王以及由巴州遷

葬乾陵的章懷太子墓等皇族，但亦包括終身無任何官銜的張思忠夫婦墓。西安西郊一座墓室長不及三公尺的單室土洞墓也出土了一件三彩雙龍柄壺，這就說明了雙龍柄壺未必是被皇室貴族所壟斷的器式。其次，目前也看不出這類通高約在三〇~五〇公分之間的雙龍柄壺有隨著尺寸大小或色釉種類而出現的不同等級意涵。話雖如此，近年公佈的恭陵哀皇后墓所出施罩鈹藍鉛釉的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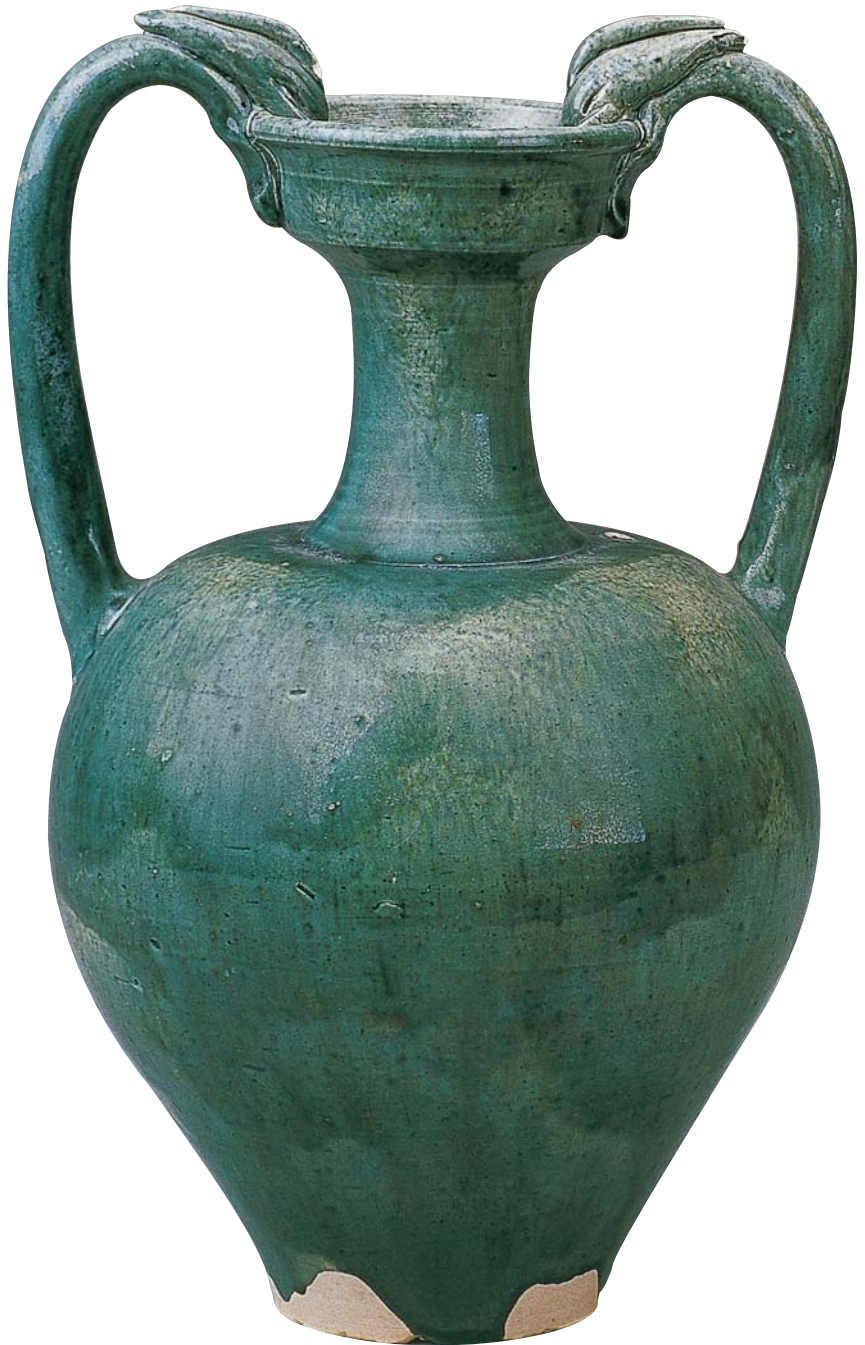
圖五 高46.5公分 河南鶴壁王仁波墓出土



圖七 河南偃師神龍二年宋祐墓出土

龍（鳳？）柄壺之精良程度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同圖六）。就目前的資料看來，A型壺主要流行於七世紀至八世紀前期的初唐至盛唐期，其中唐三彩鉛釉系作品則集中於七世紀後半至八世紀初期，（謝明良，一九八五）可惜目前還缺乏足夠的資料得以進

行精密的編年排序。就此而言，過去有人僅僅依恃少數幾件出土資料即武斷地主張雙龍柄壺的「演進規律」是龍柄由高直而矮拱弧等論點，（王光堯，一九九九）可說是完全不合乎事實的任意猜想。其次，近年由中國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寫的《鞏義芝田



圖六 高32.2公分 河南偃師垂拱三年恭陵哀皇后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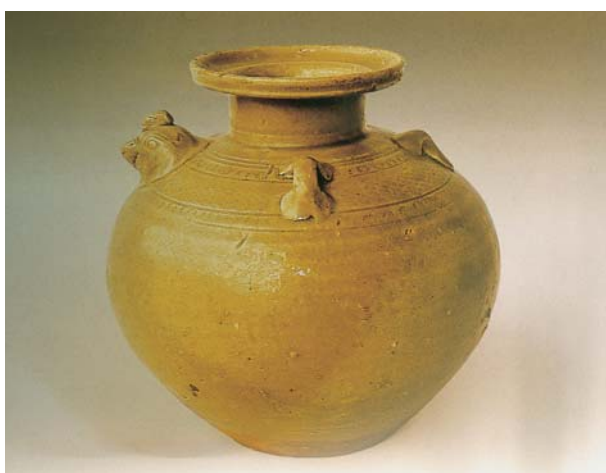
圖九 通高51公分 河南鞏義北窯灣六號唐墓出土



圖八 雙龍柄壺 白釉高41公分 三彩高36公分 河南伊川墓出土

晉唐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因將出土有白瓷雙龍柄壺的93HGSM1和伴出有白瓷和三彩雙龍柄壺之92HGSM1的年代分別設定於六八〇~六九〇年和六九〇~七〇〇年，乍看之下編年精細，故而被視為今後唐三彩鉛釉陶編年的里程碑而大加褒揚。(今井敦，二〇〇五)然而，只需稍事檢驗該發掘報告書的編年依據，不難發現其論證拙劣且頗有強行附會之嫌。本文無暇在此對該報告書多做評論，不過就和本文直接相關的議題而言，鞏義92HGSM1的龍柄壺之造型和裝飾特徵其實和同省偃師神龍二年(七〇六)宋祜墓所出三彩作品大體一致(同圖七)。

此外，在觀察雙龍柄壺出土例時還有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即其經常是兩兩成雙地陪葬入壙。如李鳳墓、張思忠墓或鞏義93HGSM1號墓均分別出土一對白瓷或黃釉雙龍柄壺。饒富趣味的是河南伊川墓(圖八)和鞏義92HGSM1號墓不僅各出現一對該類壺，並且均是以高溫白釉瓷搭配低溫三彩釉陶的形式共伴出土，至於現藏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原河南省博物館藏的兩件器形壯碩的淡黃釉雙龍柄壺，亦可從其尺寸大小和壺身貼花裝飾等推測，其應是出自同一墓葬的成對作品。另一方面，由於雙龍柄壺口徑較窄，而壺口龍首又往往被誇張地強調，致使部份作品龍首幾乎填滿整個口部，不利於使用(圖九)。這不由得會讓人疑心這類帶柄獸首壺是否確屬生活實用器具？抑或有其他的用途？除了前述令人側目的墓葬成對配套的出土情況之外，西安新西北火車站墓這座未經盜掘的土洞墓是以一件三彩雙龍柄壺暨二十餘件陶俑的形式共存於墓葬；偃師山化鄉四號墓所出三十餘件陶瓷當中，雙龍柄壺是唯一施罩有三彩色釉的作品，顯得鶴立雞群、極為突出。無論如何，就目前的考古發掘資料看來，存續於七世紀初唐至八世紀前半盛唐時期的雙龍柄壺於安史之亂後似已音訊杳



圖十 山東臨沂洗硯池晉墓出土

然，迅速地消失，這也是一個應予留意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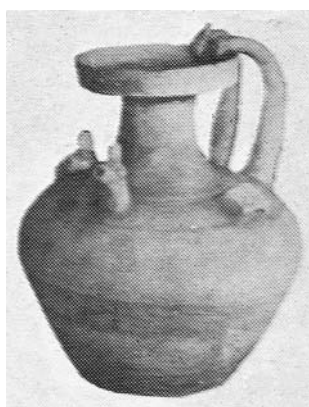
### 三、從雞頭壺到雙龍柄壺

如前所述，唐代雙龍柄壺是於造型呈盤口、細長頸、豐肩、修腹的一般所謂盤口壺的口沿至肩部加置雙把，而雞頭壺則是於盤口壺口肩部位一側置把，對側壺肩飾雞頭，單把把端亦多飾龍首。以上兩種壺式均是以盤口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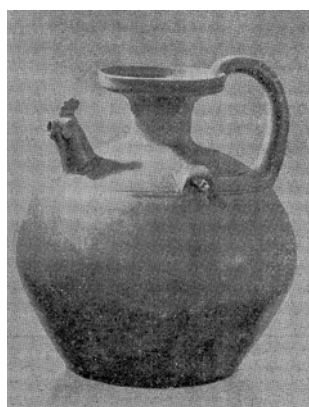
為基本器形，其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一為雙把，另一為單把雞首。因此，追索盤口壺和雞頭壺的形式變遷，無疑有利於評估雙龍柄壺器形的淵源出自。事實上，龜井明德已曾有過類似的考察，但相對於龜井氏是以北朝雞頭壺為例進行溯源，本文則擬追溯至雞頭壺成立之初的三國西晉時期。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往上追索，其原因非常簡單，即帶把雞頭壺的出現模式，其實和雙龍柄壺的成立模式極為類似，所以很有參考的價值。

有關六朝雞頭壺的考古發掘資料數量較多，為免繁瑣，本文將以刊載有清楚圖版的紀年墓葬出土標本為例進行觀察。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於盤口壺壺肩飾雞頭的實例可上溯至西晉時期，除了浙江平陽元康元年（二九一）墓（《考古》一九八八·一〇）、杭州太康八年（二八七）等西晉紀元墓之外（《東南文化》一九八九·二），近年報導的山東臨沂洗硯池西晉墓也出土了越窯青瓷雞頭壺（圖十）。

後者係於口徑相對較大的淺盤口下方置粗直頸，頸下接球圓腹，於壺肩兩側置縱向半環繫耳，其餘兩側分別飾雞頭和雞尾椎，雞頭無頸，無把（《文物》二〇〇五·七）。從江蘇南京象坊村東晉太興二年（三一九）吳氏墓（《考古》一九六六·三）或同省鎮江丹徒東晉咸康元年（三三五）等紀年墓亦見類似作品（《文物資料叢刊》一九八三·八），可知此型式的雞頭壺於四世



圖十二 江蘇鎮江東晉墓出土



圖十一 南京東晉升平三年王閏之墓出土

紀前期仍然持續生產。不過，至遲在四世紀中期開始出現於盤口壺壺肩一側飾雞頭，另一側口沿至肩部位安裝把手的作品，如南京東晉升平三年（三五八）王閭之墓出土作品即為一例（《文物》一九七二·一）（圖十一）。屬於該類型的帶把雞頭壺雖亦有多種亞型，如鎮江東晉墓（《文物資料叢刊》一九八三·一八）（圖十二）或四川彰明常山村崖墓曾出現於壺肩一側飾雙雞頭，對側置泥條形雙把的作品

（《考古通訊》一九五五·一五），釉色除了青瓷之外，如杭州興寧二年（三六四）褚府君墓可見黑釉作品（《考古》一九六一·一七）。但整體而言，其盤口壺的造型均已較西晉作品初期修長，不僅盤口加深，頸部拉長，壺肩所飾雞頭亦多伸長頸部，同時壺肩所飾雞耳亦多屬橋形橫繫，其既和前述西晉至東晉初期作品有明顯的區別，卻又和三國西晉以來的同式盤口壺一脈相承，應屬同一器式不同時

段的產品。就是因為這一緣故，歷來的研究者一致認為帶把雞頭壺是由前期的僅飾有雞頭和雞尾椎的無把雞頭壺演變而來的。（謝明良，一九九二）雖然，誰也未能清楚交待雞頭壺為何會於四世紀中期前後，突如其來地由原本可能是表現雞尾椎的小貼飾，蛻變成連接於壺口和肩部位的把手，並且又於四世紀中後期出現了於把端加飾龍首的條形單把以及由雙股泥條平行併合而成的龍首飾

表一、〈唐代雙龍柄壺出土一覽表〉

編號	出土地	墓主	紀年	件數	盜掘	文獻出處
1	陝西富平縣	李鳳及其妻劉氏	上元二年（六七五）	二	◎	《考古》一九七七年五期
2	河南洛陽（M4）	章懷太子	神龍二年（七〇六）	一（？）	？	《洛陽唐三彩》（一九八〇） 轉引自《文物資料叢刊》六（一九八二）
3	陝西	章懷太子	神龍二年（七〇六）	一	◎	《考古》一九八五年五期
4	河南伊川縣	宋禎夫婦	神龍二年（七〇六）	一	擾亂	《考古》一九八六年五期
5	河南偃師縣	張思忠夫婦	長安三年（七〇三）	二	擾亂	《考古》一九八六年十一期
6	河南偃師縣	張思忠夫婦	長安三年（七〇三）	二	擾亂	《中原文物》一九八八年二期
7	河南鶴壁市	王仁波	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	一	？	《大三彩》（一九八九）
8	河南洛陽	王仁波	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	一	？	《大三彩》（一九八九）
9	陝西西安郊區	王仁波	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	一	？	《大三彩》（一九八九）
10	河南偃師縣	盛才	聖歷元年（六九八）	一	◎	《文物》一九九〇年七期
11	河南偃師縣（M4）	盛才	聖歷元年（六九八）	一	◎	《華夏考古》一九九五年一期
12	河南鞏義市（M6）	盛才	聖歷元年（六九八）	一	◎	《華夏考古》一九九五年一期
13	河南鞏義市（GS92M1）	盛才	聖歷元年（六九八）	一	◎	《考古學報》一九九六年二期
14	河南偃師市	哀皇后	垂拱二年（六八七）	二	◎	《文物》一九九八年十一期
15	河南鞏義市	哀皇后	垂拱二年（六八七）	一（？）	◎	《中原文物》二〇〇〇年三期
16	河南鞏義市（93HGSM1）	宋祐	神龍二年（七〇六）	一	？	《偃師杏園唐墓》（二〇〇一）
17	河南洛陽關林（M1305）	宋祐	神龍二年（七〇六）	一	◎	《中原文物》二〇〇三年四期 《考古》二〇〇六年二期

\* 墓葬編號按報告年排序 \* 未註明盜掘者，包括數座無法確認是否遭盜的墓葬

雙股把。後者龍首飾雙股把之造型構思則和唐代雙龍柄壺之壺把完全一致。

南朝時期的帶把雞頭壺愈趨修長，並會銷售至北方地區，致使北方瓷窯起而做製，因此出現許多青瓷或施罩北方傳統鉛釉的低溫釉陶雞頭壺。除了山西北魏神龜三年（五二〇）辛祥墓（《考古學集刊》一期，一九八一）或山東臨朐北齊天寶二年（五五一）《文物》二〇〇二四）的青瓷雞頭壺之外，山西北齊武平元年（五七〇）婁睿墓（《文物》一九八三一〇）或武平二年（五七一）徐顯秀墓等均出土鉛釉雞頭壺，尤以後者徐顯秀墓出土一式七件通高五〇公分的大型雞頭壺最引人留意（《文物》二〇〇三一一〇）（圖十三）。著名的西安隋代大業四年（六〇八）李靜訓墓的白瓷雞頭壺即是繼承此一北朝造型而來的（《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圖十四）。

對於本文來說，李靜訓墓委實有趣。這不僅是因為該墓是出土文物豐富的皇室成員紀年墓



圖十三 通高50公分  
北齊徐顯秀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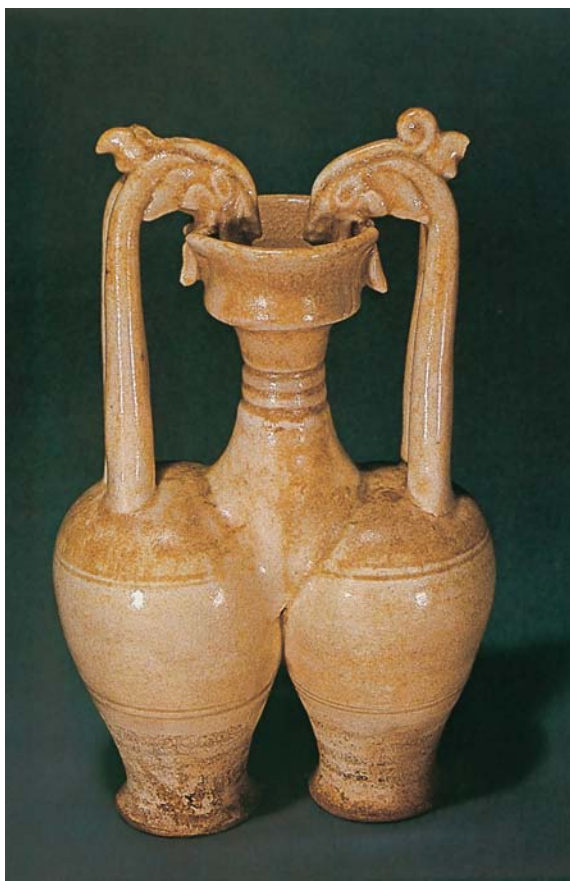
圖十四 高26.5公分  
隋大業四年李靜訓墓出土



圖十五 高20公分  
隋大業四年李靜訓墓出土

葬，也由於李靜訓墓同時伴出了盤口壺（圖十五），以及於盤口壺加飾雞頭和龍把的雞頭壺（同圖十四），和於雙身盤口壺的兩側置龍首把的所謂雙身雙龍柄壺（圖十六）。後者是於瓶罐器身兩側加飾

了連接壺口和肩部的把柄，那麼七世紀的李靜訓墓則似重演了此一變化模式，將帶柄雞頭壺的原本已經誇張拉長至可見到雞胸的雞頭飾，蛻變成了龍首柄。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雙身雙龍柄壺只



圖十六 高18.6公分 隋大業四年李靜訓墓出土

龍柄壺乃是由北朝的雞頭壺演變而成，而北朝的雞頭壺則又是來自南朝的傳統。換言之，做為唐代典型器式之一的雙龍柄壺的造型構思可上溯六朝時期。

#### 四、從阿契美尼德朝到唐朝——安弗拉式來通和雙龍柄壺的聯想

如前所述，唐代雙龍柄壺可依據圈足的有無而區分成A型和B型等兩大類。帶圈足的B型作品較少，但曾出土於河南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王仁波墓，作品所見龍形把是於蜥蜴般細長軀體上加飾四足和尾（同圖五），類似造型的龍把亦見於河北滄州出土的飾滿連珠或蓮瓣等紋飾的單把青瓷壺（《文物》一九八七·一八）。其次，傳河南汲縣出土的帶鳳頭形蓋的青瓷壺把亦屬同一類型（圖十七）。就目前的資料看來，以上兩件青瓷貼花執壺可能都來自隋至初唐時期河南地區瓷窯所燒製，其造型和裝飾則明顯做自薩珊波斯（西元三至七世紀）的金屬器，另從寧夏固原北周天和

龍首弧形把之中國最早紀年實例。

如果說，南方帶柄雞頭壺的成立是因東晉時期出現了將原本可能是表現雞尾椎的貼飾轉換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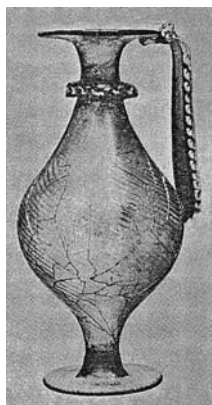
存在於隋代這一短暫時期，約略同時或稍後的七世紀前期則開始出現單身雙龍柄壺，故後者有可能是繼承前者發展而來的，至少

目前學者們似乎都同意唐代的雙



圖十七 青釉鳳頭龍柄壺 高41.2公分 傳河南汲縣出土

四年(五六九)李賢夫婦墓出土的薩珊朝鑲金銀執壺(圖十八),可知該類中國史書所謂「胡瓶」於北朝時期似仍頻繁地輸入中國。其次,與滄州等地出土青瓷龍柄盤口壺造型構思相近的作品,於薩珊朝晚期青銅製品亦可見到,後者也是在長頸壺壺口和器腹之間加飾表現出四足和尾的獸形把(圖十九)。其實,這類帶喇叭式高足的把壺之器式可上溯帕提亞朝(Parthian, 247BC~AD 224)或



圖二〇 紀元前四世紀羅馬玻璃帶把瓶



圖十九 薩珊朝晚期青銅製把手付水瓶

阿契美尼德朝(Achaemenidae, 600~400 BC),以及紀元前四世紀的羅馬玻璃器(圖二〇),可以說是當時羅馬、東方流行的器式之一。(深井晉司,一九六五)雖然中國廣州、揚州漢墓或洛陽出土的羅馬玻璃器當中未見類似器形的作品,不過朝鮮半島慶州皇南洞第九八號南墳則出土了同樣帶喇叭式高足的羅馬玻璃把壺(圖二一) (慶州文化財研究所,《皇南大塚 慶州市皇南洞第九八號南墳發掘調查報告書》I, II, 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後者產地推測是在地中海東岸敘利亞,其年代約於東、西羅馬分裂(三九五)至西羅馬帝國滅亡(四七六),即所謂後期羅馬玻璃。

另一方面,做為本文主要論旨,數量龐大的唐代A型雙龍柄壺的可能淵源出自,亦頗耐人尋味,因為著名的伊朗法斯省波斯波利斯(Perspolis)之亞美尼亞人朝貢圖(detail of the Tribute of the Armenians, 600~500BC)已見類似造型的安弗拉式來通(Amphora-rhyton)(圖二二)。其



圖二四 安弗拉式來通局部線繪圖

次，於阿契美尼德朝統治下的色雷斯 (Thracian)，即今保加利亞的 Douranli Koukora 古墳也出土了年代在西元前六至四世紀的金屬製品 (圖三)。後者獸把中空與器身相通，並於一側加置可傾注液體的流。值得留意的是，做為把柄的聖獸前肢至肩部位裝飾有表示鬘毛的渦形鬘飾 (圖四)，而此一起源自美索不達米亞，經亞述 (Assyria) (圖五) 而傳至阿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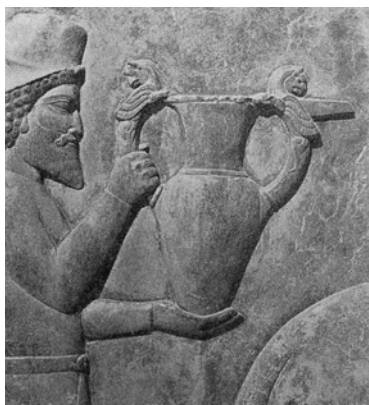
圖二一 帶喇叭式高足玻璃把壺 朝鮮半島慶州皇南洞第98號南墳出土



圖十八 北周 鑿金銀壺 寧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李賢夫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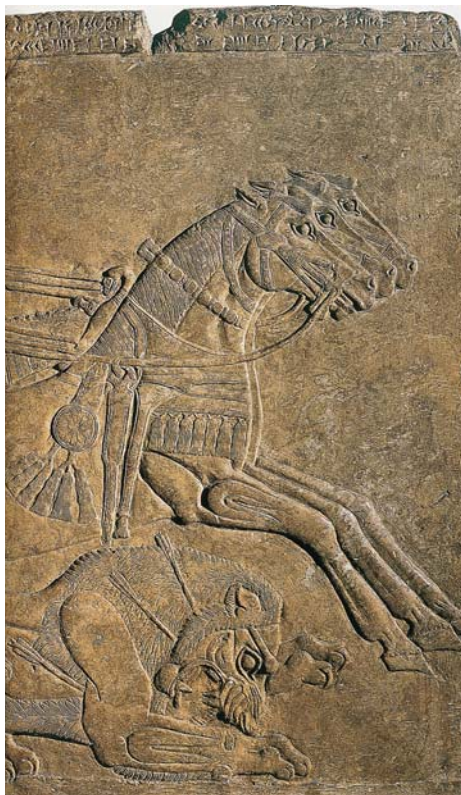
圖二三 安弗拉式來通 保加利亞Douranli Koukora 古墳出土



圖二二 伊朗法斯省波斯玻利西亞美尼亞人朝貢圖



美尼德朝的紋飾，不僅為薩珊朝波斯所繼承，也經由泛希臘文化傳至中亞，故希臘系今巴基斯坦的犍陀羅西元二至三世紀的「童子騎獅」的獅子前後肢近身軀關節處亦見渦形鬘飾，其後並影響到中國，如雲岡石窟第一六洞北魏五世紀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兩側的獅子身軀即見多處渦形鬘飾 (圖二五)。(田邊勝美，一九八九) 設若上述的推論可信，則從獅子圖像上的渦形鬘飾似乎說明了阿契美尼德朝，甚至於集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之大成的亞述帝國的文化要素曾經由中亞傳入中國，然而唐代 A 型雙龍柄壺是否亦可據此脈絡尋覓其祖型？眾所周知，與隋唐物質文明息息相關的薩珊朝波斯，其既和阿契美尼德王朝均發祥於波斯，同時也是阿契美尼德文化的傳統繼承者。有趣的是，現藏伊朗德黑蘭考古美術館的一件於壺身錘揲出豐饒女神阿娜希塔的鑿金銀壺，目前雖僅存源自羅馬的梨形 (Pearl form)，即中國所謂「玉壺春」壺身，但



圖二五 亞述Nimrud北西殿〈國王狩獵圖〉  
西元前875-860年 大英博物館藏



圖二六 雲岡石窟第十六窟  
北魏五世紀交腳彌勒菩薩像

深井晉司從壺口兩側有穿孔，穿孔正下方之器肩部位遺留有焊接痕等推測，此一薩珊波斯五世紀時期的銀壺原應配置有安弗拉式的雙把，結合器底兩側所設置的獸面注口（圖二七），可知其器

式正是淵源自阿契美尼德朝的安弗拉式來通。（深井晉司，一九六八）  
問題是，唐代A型雙龍柄壺之祖型果真來自薩珊波斯甚或阿契美尼德朝的安弗拉式來通？我們應該留意，阿契美尼德朝的安弗拉式來通之獸把裝飾不只一式，其還包括於壺把頂端加飾禽鳥的作品（圖二八）。無獨有偶，一九八〇年代洛陽陽凹村即出土了柄端另飾禽鳥的唐代雙龍柄白瓷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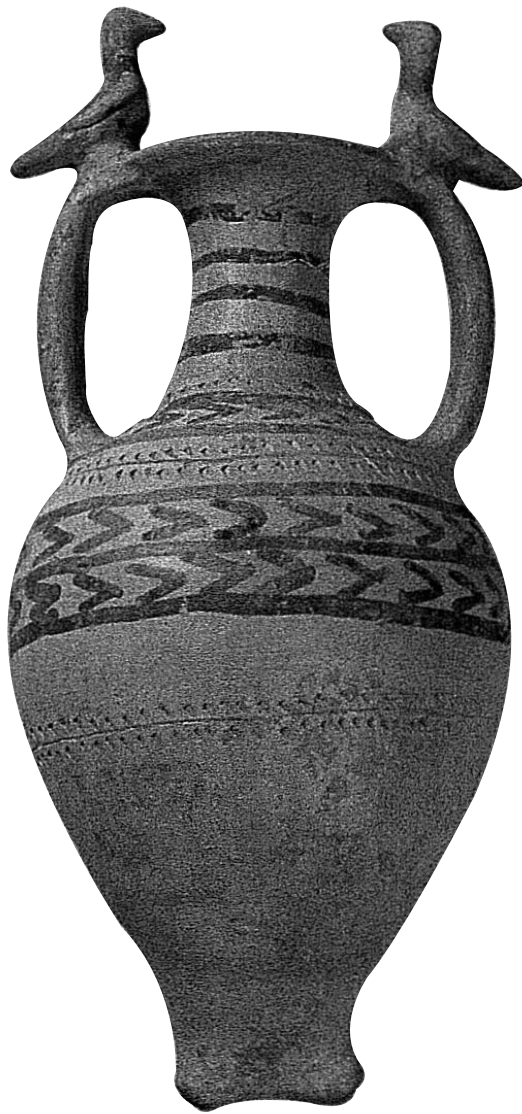
器底所見獸面注口

圖二七 薩珊波斯 鑲金銀壺 伊朗德黑蘭美術館藏

（圖二九）。不僅如此，中亞和闐約特干（Yokan）也曾出土定年分歧，可能在一至三世紀或遲至七到八世紀的柄端飾鳥（圖三〇）或獸首（圖三一）的各式貼花陶壺。可以附帶一提的是，後者口沿內側和頸肩部位均陰刻一周重圈紋，而類似構思的重圈紋亦見於亞述王三世（Reign of Tiglath-Pileser III, 744~727BC）中央宮殿的石刻「攻城圖」（圖三二）。除了湖南長沙西漢滑石壁之外（《南京大學文物珍品圖錄》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二），朝鮮半島新羅陶



圖二九 高44.5公分 洛陽陽凹村出土



圖二八 阿契美尼德朝的安弗拉式來通

器（約三、七世紀）也常見到類似的重圈紋飾。

這看來，儘管以中國雞頭壺的器式編年可以得出唐代雙龍柄壺乃是承襲六朝以來雞頭壺造型的推論，我們仍舊沒有理由忽視甚至可以積極主張唐代雙龍柄壺的器形乃是受到薩珊波斯同式壺的影響，而其祖型則可溯自阿契美尼德朝的安弗拉式來通，只不過中國將柄端的獸首置換成該國傳統的龍首或鳳首形像罷了。

### 五、隋代雙身龍柄壺的聯想

在談及唐代的雙龍柄壺時，首先碰到的難題，即是其和隋代的雙身龍柄壺是否有演變、繼承的關係？截至目前，可確認的雙身雙龍柄壺近十件，但有確實出土地點可考者，只有西安隋大業四年（六〇八）李靜訓墓的白瓷（同圖一六）、洛陽城的鉛綠釉（圖三三）以及安徽壽州窯系的青瓷作品（表二參照）。雖然當中只有李靜訓墓帶有明確紀年，但因考慮到目前所見雙身雙龍柄壺造型大體相



圖三一 高14公分  
中亞和蘭約特干出土



圖三十 高26.0公分 中亞和蘭約特干出土

近，所以學界習慣上都將該類瓶式的時代訂定於隋代。龜井明德在仔細比對現存所有的雙身雙龍柄壺後，曾經提示目前所見雙身雙龍柄壺多是通高在二〇公分以下的小型作品，其和單身雙龍柄壺有的高逾五〇公分有顯著的區別，因此，此一從雞頭壺發展而



圖三二 亞述王三世 中央宮殿的石刻〈攻城圖〉大英博物館藏

來且僅止存在於隋代後期的雙身雙龍柄壺，未必和單身雙龍柄壺有直接的繼承發展關係。這也就是說，雙身雙龍柄壺是隋代這一短暫時期突如其來的創作，並且有如曇花一現、倏忽音信杳然而至消逝無蹤。

但我認為龜井氏的良心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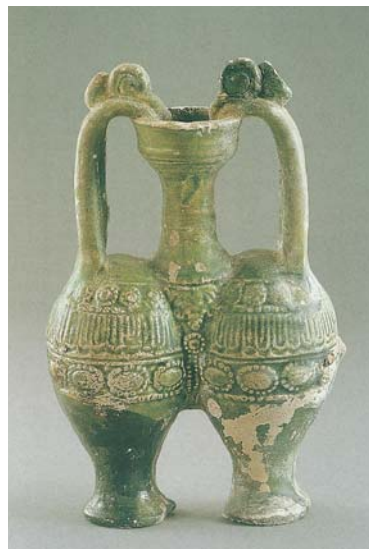
仍有商榷的餘地。比如說現藏於芝加哥市立美術館的一件青釉雙身雙龍柄壺之口頸部位造型特徵（圖三四），就和山西天統三年（五六七）韓裔墓《文物》一九七五—一三六（圖三五）或同省太原金勝村北齊壁畫墓《文物》一九九〇—一二二出土的雞頭壺大體一致。與此同時，



圖三五 山西天統三年祁縣韓裔墓出土



圖三四 北齊至隋  
美國芝加哥市立美術館藏



圖三三 高18.6公分 洛陽城宮城出土

其器身腹造型裝飾則又與隋代李靜訓墓出土的白瓷扁壺有許些相近之處(《考古》一九五九·九),故有理由將其年代定於北齊至隋代,這從以李靜訓墓為代表的雙身雙柄壺之盤口相對變窄,頸部趨於修長一事亦可檢證芝加哥壺的年代應較早。

如果此一定年方案無誤,那麼我們就可以經由其與李靜訓墓等隋代雙身雙柄壺之造型進行比較和排序,並可得出結論認為:相對於芝加哥美術館北齊至隋作品壺身因中軸部位劇烈弧度內凹,而形成連底的雙身壺式,李靜訓墓等隋代作品雖有模製和轆轤等兩種不同的成形技法,然外觀上均是由兩件豐肩修腹瓶接合成器底不相連接的典型雙身壺式。我不敢肯定前述連底雙身瓶

的器式,有無可能是由河南省武平六年(五七六)(《文物》一九七二·一)范粹墓亦見出土的印花扁壺再加置雙龍柄演變而成?抑或竟也是來自西方?在此應予一提的是,前引傳河南汲縣出土的帶鳳首形蓋的青瓷單把壺,其器身連珠餅形飾所見人物其實並非以往許多人所推測的所謂舞蹈力士。

從人物下額蓄鬚,手持葡萄,近足處有傾倒的壺瓶看來,其表現的應是希臘的著名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同圖一七)。(石渡美江,二〇〇二)另從義大利塔克尼亞(Tarquintia)出土的紀元前六世紀黑像式安弗拉陶壺,壺身繪飾葡萄藤蔓和戴奧尼索斯顏面(圖三六),故不排除前述(圖三四)北齊至隋雙身連底壺壺肩葡萄紋飾下方,雙壺壺肩正中所飾人面

編號	出土或收藏地	紀年	種類	文獻出處
1	陝西西安李靜訓墓出土	隋大業四年(六〇八)	白瓷	《唐長安城郊隋唐墓》(一九八〇)
2	河南洛陽城出土		鉛綠釉	《遣唐使が見た中國文化》(一九九五)
3	安徽省博物館藏		黃釉	《考古》一九七八年八期
4	天津市博物館藏		白瓷	《文物》一九七七年一期
5	連雲港市博物館藏		白瓷	《中國陶瓷全集》五(二〇〇〇)



圖三八 西元前1000~800年，黑陶安弗拉式來通 日本大阪私人藏



圖三七 香港徐氏藝術館藏



圖三六 黑像式安弗拉陶壺 西元前六世紀 義大利塔克尼亞出土

亦為酒神戴奧尼索斯？因為做為釀酒原料的葡萄和人物或人面之組合，正是戴奧尼索斯習見的登場方式。就此而言，分別收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Suzanne G. Valenstein, Oriental Art, vol. XLIII, no. 4, 1997/8*）和香港徐氏藝術館的成對隋代綠釉陶壺，壺身所見我以前冒然地將之與希臘神話女妖美杜莎（*Medusa*）相提並論的鬍鬚人面貼飾（圖三七），有較大可能也是酒神戴奧尼索斯。值得留意的是，戴奧尼索斯雖是希臘、羅馬的酒神，然其原本係阿契美尼德朝治下色雷斯等地的豐饒神。

無論如何，我們應該留意阿契美尼德朝樣式的安弗拉式來通其實有多種造型，其器底兩側雖多鏤孔，但於外觀上卻有不同的造型，其中有的作品是將器底雙孔表現成兩個略近袋足的乳房狀（圖三八）。至於中國北朝至隋代工匠們是否可能將此類下腹略呈雙身的安弗拉式來通，詮釋、改變成具有特色的雙身雙柄壺？目前不得而知。

設若本文以上有關北齊至隋代雙身雙柄壺的造型變遷推論無誤，則對於唐代雙龍柄壺為何經常會以兩件成對的組合方式出土於墓葬，即可得到相應的解釋。那就是北齊至隋代由連底雙身雙柄壺發展至隋代後期出現了分底雙身雙柄壺，而後雙身一分為二，獨立成了一對陪葬入壙的器物。就目前出土有兩件雙龍柄壺的五座唐代墓葬而言，有兩座墓伴出有墓誌，其分別是上元二年（六七五）李鳳及其妻劉氏墓和長安三年（七〇三）張思忠及其妻趙氏墓，夫婦合葬墓出土成雙的雙龍柄壺一事確實耐人尋味。過去深井晉司曾經推測這類年代上溯西元前一〇〇〇年，下限不晚於薩珊朝，且出土分布限於伊朗高原北部西亞地區的安弗拉式來通，有兩種可能的用途。其一是義兄弟結盟時，兩人同時自壺底注口吸飲聖酒，再則是男女結婚時，雙方同時自注口飲用聖水。唐代夫婦合葬墓出土成對的雙龍柄壺是否亦具夫婦合壺之象

徵意涵？抑或另有其他功能？另外，據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唐代白瓷雙龍柄壺，器腹有「□三保客□龍一虎一鳳凰龍虎在家待對母□」等銘文，（董健麗，二〇〇五）然而文意難解，因此有關唐代雙龍柄壺的確實功能，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考古發掘資料來解決。

### 小結

就目前可確認的考古發掘實例看來，雙龍柄壺最早出現在六世紀後期的北方，其時多安裝於雙身瓶的兩側。主要流行於隋代

（五八一～六一八）的雙柄雙身瓶的出土地包括陝西、河南和安徽等三省分，而唐代的雙龍柄壺則分布於陝西和河南兩個省分，此說明了隋唐時期的雙龍柄壺明顯流行於關中和中原地區。由於雙身雙龍柄壺和單身雙龍柄壺的出土分布又頗有重疊，此一現象也反映了兩者之間是有繼承發展的親緣關係。

從隋代李靜訓墓出土例，可以確認雙身雙龍柄壺和雞頭壺是當時並存的兩種器類，而當雙身雙龍柄壺過渡發展至盛行於唐代的單身雙龍柄壺，分布於南北兩

地的雞頭壺仍然與之平行共存，但兩者於北方地區八世紀中期卻戲劇性地同時消逝無蹤。由於唐代的雙龍柄壺壺口常被碩大的龍首蟠踞而至不利實用，故或可將之歸入祭器或明器之列。無論如何，雙龍柄壺其實只是唐帝國的一個特定區域的產品，其與南方地區完全無緣。儘管目前還不能確認雙龍柄壺的確實用途，但今後若將之納入唐代「明器文化圈」的角度予以省思，或許可以相對清楚地追蹤其來龍去脈並釐清其可能的用途，但此均還有待日後的努力來解決。

1. 今井敦，〈唐三彩をめぐる諸問題〉，《遣唐使と唐の美術》（東京：朝日新聞社，二〇〇五），頁一一一。
2. 王光堯，〈唐代雙龍柄壺研究〉，《華夏考古》一九九九年三期，頁一〇一。
3. 田邊勝美，〈獅子舞からメソポタミア・エジプトへ〉，《掛川西高校「研究紀要」二〇〇號（一九八九），頁三二～三四。
4. 田邊勝美，〈ガンダーラ美術の獅子像のイラン要素〉，《金澤大學考古學紀要》二〇〇號（一九九三），頁五〇～七一。
5. 石渡美江，〈樂園の圖像 海獸葡萄鏡の誕生〉，《歴史文化ライブラリ一九七（東京：吉川弘文館，二〇〇〇），頁一五一～一五一。
6. 深井晉司，〈アナーヒター女神裝飾鍍金銀製把手付水瓶〉，原載《國華》七八號（一九六五），後收入同氏，《ペルシア古美術研究》ガラス器・金屬器（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六八），頁一六二～一六三。
7. 深井晉司，〈アゼルバイジャン地方出土獅子形把手付土製壺について—作品底部にみられる二つの注口の問題について—〉，原載《國華》七七編九冊（一九六八），後收入同氏，《ペルシア古美術研究》第二卷（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八〇），頁一八～一九。
8. 董健麗，〈唐雙龍柄壺〉，《文物世界》二〇〇五年四期，頁五〇。
9. 龜井明德，〈隋唐龍耳瓶的型式與年代〉，《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六期（一九九九），頁四三～六九。
10. 謝明良，〈唐三彩の諸問題〉，《日本成城大學》《美學美術史論集》五輯（一九八五），頁四三～四四。
11. 謝明良，〈雞頭壺的變遷—兼談兩廣地區兩座西晉紀年墓的時代問題〉，原載《藝術學》七期（一九九二），後收入《八朝陶器論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二〇〇八），頁三三四。